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 是庞杂的精神糟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汤重南

内容提要：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渊源和精神支柱是武士道，还有日本神道教、佛教和儒学中的思想糟粕以及“神国”、“皇国”观念和史观。进入近现代后，又加上了从西方引进的沙文主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奉为其思想理论基础。因此，是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腐朽反动思想的大杂烩。

关键词：日本军国主义 思想理论 侵略扩张 社会达尔文主义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了侵华战争，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后，又炮制了伪“满洲国”。接着，于1937年7月7日，又在北京西南卢沟桥畔挑起了震惊中国与世界的“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按蓄谋已久的计划，疯狂地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29日，侵占北平；30日，侵占天津；8月13日又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事变，11月侵占上海；12月13日侵占南京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从此，日军攻城掠地，铁蹄践踏了我国半壁河山，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累累罪行。在侵华战争的15年间，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无比巨大的损失：伤亡3500万，其中死亡20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罪恶,是人类史上罕见的,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的破坏最大,占地最广,确实创深痛剧,使我民族在物质上、精神上受到最为严重的伤害,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破坏。这段中华民族悲惨苦难的历史,是不会因岁月流逝而淡忘的。日本军国主义及其罄竹难书的罪恶,理所当然地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南亚各国及远东军事法庭的正义审判,钉死了这一铁案。日本军国主义已被历史永远地钉在了耻辱柱上。

本文拟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渊源、核心及军国主义法西斯化的思想理论基础三方面进行概略阐述和剖析,揭示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以加深我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认识。

一 武士道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精神渊源

日本军国主义,是指近代的即从 1868 年明治维新后形成与发展的日本军国主义,而法西斯主义,则是日本帝国主义陷入全面危机时期军国主义的极端表现。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渊源于日本封建军国主义,它以军部为核心,以“军事立国”,即对内实行极权统治和统制经济为其“根本国是”,对外以武力扩张的“大陆政策”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其基本国策。一句话,军国主义是以“军事立国”并进行统治的反动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和精神支柱则是日本武士道。

日本武士产生于公元八九世纪,从 11 世纪起,日本武士阶层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以 1192 年源赖朝被大权旁落的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建立镰仓幕府为标志,武士掌握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镰仓幕府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武士政权,从此,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足利尊氏于 1336 年建立的室町幕府为第二个武家政权,而德川家康于 1603 年建立的江户幕府则是第三个武家政权。日本武士阶级以攻战

杀伐为职业，自然是自古代中世纪已出现的军国主义的鼓吹者，是军国主义政策的制定者、推行者和身体力行者。而日本武士阶级掌握中央及地方实权的幕府时代长达 676 年之久，出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需要，逐渐形成了武士道，从而使日本具有军国主义思想文化传统。

武士道，即武士精神，它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忠勇义烈和绝对服从等讲究“信义”、“廉耻”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导源于神道、佛教、儒学及皇国迷信的日本武士道，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即江户时代前的旧型武士道、江户时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维新后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及国民精神的武士道。

旧型武士道只是较为粗陋的“武者之习”、“兵之道”和“实践之道”，是作战争斗者的伦理规范，它崇尚和重视主从关系，强调和讲究复仇和殉死，是超越理性和不辨是非只倡导为主君献身的武士道。旧型武士道的典型代表人物宫本武藏是著名剑道家，他受传统武士道精神支配，一生中表现了日本武士传统的好勇斗狠和极端残忍性。宫本所著《兵法三十五条》，将自己平生练功、惊险决斗体会及剑道新派别的要领、兵法奥妙均详细写明。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做法及精神，为侵略战争服务。

在江户时代，对武士道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学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这种新的“士道”论者以山鹿素行为主要代表，与旧型武士道论既相联系又相对立。

1868 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及行动准则的武士道，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思想和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仍以儒学伦理为基干,受佛教禅宗及神道教的诸多影响,但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扬弃转化。武士道的内容既有舍弃,亦有保留,更有较大的发展变化。

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武士道,对内作为精神工具,毒化和控制日本国民的思想,对外则鼓舞和踏上了侵略亚洲各国的道路。由此拉开了日本近现代史上武士道穷兵黩武、为战争服务的罪恶帷幕。

二 侵略扩张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核心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侵略扩张思想。从日本历史上看,它经过了两大阶段:一是日本古老的封建主义赤裸裸的开疆拓土的武力扩张思想,二是近代以来受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理论和思想影响的侵略扩张思想。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思想由来已久,在传说中的首代神武天皇发布“诏敕”中,就有“八纮一字”(将五洲四海置于天皇一人统治之下)及“皇道”的用语。更有这一帝国理想的实践者,即关于神功皇后征讨新罗(朝鲜南部)等地,三次用兵,大获全胜的神话传说。后来历代统治者均对她推崇有加。到 16 世纪末期,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和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他的扩张思想和侵略野心之大达到空前高峰,集日本封建统治者扩张思想、对外侵略行动之大成。在丰臣之后,日本不少思想家及统治者,总不断鼓吹其计划,宣扬其思想,致使日本对外侵略思想在 300 多年间延绵不绝且日益猖獗。

丰臣秀吉 1585 年出任“关白”(摄政),总摄日本国政,1586 年又任太政大臣,掌握日本政权后,为解决统一后的日本社会矛盾和个人野心不断膨胀及霸权思想作祟,提出和采取了对外扩张的计划和政策。

丰臣死后,德川家康通过 1600 年的关原之战,确立了统治全国的地位,并于 1603 年建立江户幕府。德川家康依然企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封建主义国际秩序。1610 年,以幕府执政本多正纯的名目,实由大学头林罗山起草了致中国福建总督的信函。该函称:日本国主源家康已统一全国,“其德化所及,朝鲜入贡,环球称臣,他如安南、交趾、占城(均为今越南),暹罗(泰国)、吕宋(菲律宾)、西洋(指新加坡以西)、柬埔寨等蛮夷之君主酋长,莫不献表纳贡”。此信所言并非均是事实,亦不知是否交到了中国,但它却具体而清楚地表达了德川家康追求的政策目标。

到江户幕府晚期,西力东渐,幕藩体制陷于困境,尊皇思想及攘夷论开始出现,涌现出一批思想家,他们继承和发展了秀吉封建主义的扩张思想,不仅将其体系化、具体化,而且寻找到冠冕堂皇的美妙借口,打出了漂亮动听的更富有欺骗性的招牌。

将日本尊皇思想充分阐述的是日本国学集大成者本居宣长。他把日本说成是天照大神创造的神国,提出了日本的优越地位观念和尊崇天皇的思想。他还宣扬“八纮一字”的对外侵略扩张思想,即将世界各国置于日本支配之下,梦想征服世界。还声称“神道”精神,尊皇和日本优越等观念,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变为“大和民族优越论”、“国粹主义”,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舆论工具。

从 18 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力倡开国论、海防论、海外雄飞论及攘夷论的经世学派、维新运动先驱者们,都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推行的对外扩张的世界战略,提供了大量的思想素材。在他们复杂的思想体系中,既有图利进取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市民精神,也有对外进行殖民扩张的思想;既有民族危机感和民族忧患意识,也有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对外武力扩张思想。其代表人物有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藤田幽谷、会

泽安、吉田松阴、岛津齐彬、桥本左内等。

林子平在《三国通览图说》(1785年著,书中三国指朝鲜、琉球和北海道)中,全面介绍朝鲜八道、琉球三省36岛和虾夷地(北海道)的历史沿革、文物制度、风俗习惯、地理物产等情况,供日本人了解周边国家和地区。1786年林子平又著《海国兵谈》,纵论五大洲形势。

仅比林子平小六岁的本多利明,亦和林子平一样,主张对外开发和殖民,也把叶卡捷林娜二世作为理想的形象。本多利明在1798年所著《经世秘策》一书中,主张确定世界战略的极终目标,即征服世界,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本多利明要求日本实行殖民“开拓制度”。他主张把大日本岛的国名改名为“古日本”,把“本部”(首都)迁到与英国伦敦同一纬度的堪察加,在与巴黎同一纬度的“西唐太岛”建筑大城郭,更加发展与山丹和“满洲”的贸易,甚至欲将中国和美洲大陆作为“扶植日本国力之地”,先进攻“满洲”、库页岛等地,以完成“大日本帝国”的建设。

将经世学派思想主张充分展开、发挥的集大成者是佐藤信渊。他在1823年的《宇内混同秘策》首句中即提出,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乃世界万国之本”。他所追求的目标是将全世界“混同”为日本郡县,使“全世界悉为皇国(日本)之郡县,万国君主皆为臣仆”,“皇化”全球,主宰世界。

比佐藤信渊稍小一点的水户藩(现茨城县)藩士藤田幽谷,也与佐藤的主张、思想相当一致,他曾在力陈“北虏(俄罗斯)之警”的同时,做诗言志道:“宇内至尊天日嗣,须令万国仰皇朝。”

曾师事藤田幽谷的会泽安(亦称会泽正志斋),在国体论、开国远略及国家膨胀之策等方面,与佐藤信渊并无不同。他主张日本是“神州”,是“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认为日本应“皇化”万国,“拯四海万国于涂炭,使天地之间不复有西夷之妖教

(西方天主教),中原赤子(中国国民)永免于胡羯(西方列强)之欺罔”。他以其著名的《新论》影响了幕末维新时期的许多志士,当时“幕末志士几乎无人不谈《新论》,《新论》成了攘夷运动的经典”。尊王攘夷论一度“风靡天下”,直接影响了一代志士。

如果说,正志斋的《新论》“使武士作为志士而奋起”,那么吉田松阴的言传身教,则直接影响了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及近代日本的建设者。吉田松阴兴办的“松下村塾”成了“孵化颠覆德川幕府之卵的保育场”、“点燃维新变革天下之圣坛”。倒幕维新及明治政府的重要人物如高杉晋作、久坂玄瑞、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前原一诚、山县有朋等,皆系松阴门人,其塾生计 80 人。其山鹿(素行)流派的兵学弟子共 300 人,为明治维新立下功勋之有爵位者、赠位者、有位者共达 37 人之多。必须指出的是,在松阴“开国攘夷”、“富国强兵”的思想中,始终存在着一股对外侵略扩张的暗流。由于松阴依然没有脱却将日本视为“神国”的传统观念,声称“凡生皇国宜知吾所以尊宇内”,决定了他的思想主张与佐藤信渊等的社会思想存在着一致性。松阴提出:将失之于欧美的“交易之处”,“偿还于鲜(朝鲜)、满(中国东北)之土地”。这种失之于西方者,补偿于鲜满的主张后来成为明治政府的一大战略。

松阴这种“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力图将压迫强加在邻近国家身上的思想主张,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当中国鸦片战争抗击英国侵略失败之时,日本开明藩主萨摩藩主岛津齐彬便主张侵略中国。他主张:“以今日之形势而论,宜先出师取清之一省,置根据于东亚大陆之上。内以增日本之势力,外以昭勇武于宇内,则英法虽强盛,或不敢干涉我矣”,“彼英法远隔重洋,尚不惮用兵之劳以取之,况我日本乎?”后来的“维新三杰”中之二人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正是由岛津齐彬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都成

为明治新政府的实权派。他们又都深受齐彬思想主张的影响。

幕末经世学派代表人物及一批维新先驱志士们,是当时的先觉者,但他们的思想主张中的对外侵略扩张思想又表露得如此清晰,如此狂妄,扩张胃口之大、侵略野心之狂,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亦是当时先觉者的通病。这种思想通病是日本武士的领土野心、武士道主张“征战光荣”的必然产物,更是在幕末特定的国际国内时代条件下,受列强西力东渐危机的冲击而盲目接受西方强权政治、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结果,二者相结合,遂产生并形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系统的对外侵略思想体系。他们企图通过模仿西方殖民者对外扩张的行径,侵略和掠夺弱小国家以臻富强,进而达到参与欧美列强的殖民角逐的目的。当时还只是思想和主张,虽然野心毕露,毕竟无力行动,只是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思想主张的源头。明治维新后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行径,除了一些新的历史条件和因素外,无疑正是这种思想的继承、发展和贯彻实施。

明治维新后上台的近代天皇制统治集团,更精心炮制了对外侵略扩张的蓝图,提出了他们所谓的“大陆政策”。“大陆政策”,就是用武力向朝鲜、中国和亚洲各国进行侵略和扩张的指导方针。

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之一,是日本封建武士两大基本指导思想:一是要实现以日本为中心征服世界的野心;二是要实现“武国”观念,以武力作为立国的基础。这种“武国”的特色,就是崇尚军国主义,视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极大的“荣耀”。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就提出“大陆政策”,开始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这亦是世界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共性。各资本主义列强的产生、发展,多是在对外扩张、殖民侵略中进行的。日本更由于资本主义起步晚,对原料、市场的需要,尤为急迫,加之本身又有军国主义传统,故而推行扩张

侵略政策更猛烈、更持久。明治政府制定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富国强兵”是主体，是诸策之首。实际上，日本近代的发展走的是“强兵富国”之路。

日本之所以选择了“富国强兵”之路线，亦是历史使然。明治政府的决策者们多出身武士，其内心世界仍受武士道以“武”为业的传统职分观和崇尚武勇精神的支配，从而以“武”的视角观察世界、制定政策和确定国家发展方向。具体说来即是，对当时国际强权政治，弱肉强食的理解，亦欲循此方向走向国际社会，从而决心“以军备实力谋取霸权”。

1890年3月，刚上台担任内阁首相的山县有朋，为统一内阁成员的思想，把他1888年1月起草的《军事意见书》和刚刚起草的《外交政略论》交给阁僚传阅。《军事意见书》强调日本“应以阻止俄国侵略朝鲜作为政治战略”，表明日本侵朝的决心并不惜与俄一战。而山县有朋在《外交政略论》中，首次提出了侵略性大陆政策的“两线”论，即“主权线”外侧还有一条“利益线”，这条“利益线”是“势与邻国接触，而与我之主权线之安危有紧密联系之地区”。当时山县有朋提出，此时日本“利益线的焦点”在朝鲜。后来确实依山县构想扩大成为“满蒙生命线”和“大东亚共荣圈”了。山县的两个意见书，在内阁得到了通过，从而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指导思想。

1890年12月，日本帝国首届议会开幕，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发表首次施政演说，就公开抛出了他的“主权线”、“利益线”二线谬论，山县有朋这一理论的出笼，典型地体现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方针，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完全形成和公开出台。

1889年颁布、1890年实行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又称“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帅权，参谋本部长官有“帷幄上奏”之权，即“统帅权独立”，内阁无权过问有关军令事宜。1893年，日本

海军也建立了相当于陆军参谋本部的军令部。1893年颁布的《大本营条例》规定,大本营成员均由陆海军现役军官担任,彻底排除文官于大本营之外。1900年,山县有朋内阁又规定,陆海军大臣亦必须由现役武官担任,形成军部可通过不推荐陆海军大臣入阁或陆海军大臣辞职而不提名后继人选等方式左右内阁存废。日本军部在国家政权中的特殊地位,使日本迅速军国主义化。在20世纪初,日本已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完成了军国主义化。

三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日本军国主义 法西斯化的思想理论基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已开始制造法西斯舆论。1919年8月,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肇始者和理论家北一辉在中国上海写出《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23年出版时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该大纲鼓吹动用天皇大权、依靠军事力量实现国家的“改造”和“积极对外开战”,夺取殖民地,称霸亚洲和世界,成为颇受帝国主义分子赞扬的法西斯纲领。同年,北一辉与另一个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等在日本组织起早期法西斯主义团体“犹存社”。大川周明于1924年重弹佐藤信渊日本乃“大地最初生成之国”的老调,叫嚷“统治万国乃其使命”,并主张北占西伯利亚、南占南洋群岛。此后大量形形色色的军队和民间法西斯团体纷纷出笼。从广田内阁开始,军部政治支配地位的确立和“军财抱合”局面的形成,标志着日本建立起军国主义法西斯独裁统治。

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确立后,更极力鼓吹侵略“合理”,反侵略“有罪”,竭力宣扬“忠君爱国”、“天皇至上”,大肆掀起侵略战争狂潮。在政治军事方面,日本政府修改《国防方针》,制定《国

策大纲》，加紧扩军备战。《国策大纲》声称：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国防与外交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实际上提出了吞并东亚太平洋区域的大规模扩张方针。接着于1936年6月，为适应扩张方针的需要，修改了《国防方针》，提出了昭和新军制计划和大肆扩军、增加军费的庞大计划，将国民经济亦逐渐纳入战争轨道。1933年3月，日本悍然宣布退出国联。当德国、意大利逐步建立法西斯统治并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策源地之时，日本法西斯亦加速确立统治体制，并很快发展为东方战场的战争策源地。于是，日本、德国、意大利三个法西斯伙伴，在反共产国际的烟幕和幌子下勾结起来，1936年11月，日德签订《反对共产国际协定》，翌年11月，意大利加入，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开始形成。三国相互勾结、相互利用，走上了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道路。在思想方面，则对广大青年特别是士兵和学生强化军国主义思想教育，极力鼓吹“战争是创造的动力、文化之母”，军人是“国家之花”，大力灌输“八纮一字”的侵略思想和武士道精神。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尽管有各式各样的流派，但都没有离开以天皇为中心、奉天皇为至尊的“皇道”、“神国”思想，它只是日本传统的军国主义思想的恶性发展和极端化。其思想源流武士道精神和日本神道教、佛教、儒学中的封建糟粕以及皇国、神国史观，这些形形色色的腐朽思想交织在一起，互相渗透、融合，汇总成日本“皇道国体”的庞杂思想体系，并发展到极端。如果说还有些新鲜货色，也无非是从西方思想武库中拣来的一些思想糟粕。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中，的确也吸收和改造了德国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货色，如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等。特别是引进和推行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奉为至宝，成为其思想理论基础。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写下的《物种起源》，是人类对

生物界、动物界认识深化的里程碑,而西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古姆普洛维奇、沃尔特曼等人用庸俗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将人类社会比拟为动物界,宣扬“各种族争取生存的斗争”、“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及民族优劣的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明治维新前后,就由有西欧留学经历的一些日本启蒙思想家摄取并传入了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是日本最早的德国思想研究者,也是最早在日本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官僚学者。1882年,加藤在《人权新说》中就以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对天赋人权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鼓吹“优胜劣汰”原理。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需要,亦由于加藤的巨大影响力及他大肆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日本风靡一时,影响极大且十分深远。开始还是平民主义代表人物、后来变成露骨军国主义者的德富苏峰亦主张日本应做“世界性国家”。在甲午战争前后,他极力宣扬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合理性,在许多文章中都宣扬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他认为甲午战争的国际意义正在于:“予世界上的顽迷主义者一打击,并将文明之恩典注入野蛮社会”。原来亦是平民主义者的著名史论家、评论家山路爱山在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后放弃了平民主义,公开声明“愿做帝国主义的信徒”,极力宣扬世界已进入“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时代,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正是历史的必然,“是适者的生存,是天赐的荣耀,是社会进化所生的淘汰”。连一直主张立宪主义的浮田和民也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转变成狂热的帝国主义者。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理论基础,将日本军国主义传统文化中的形形色色货色进行改造和包装后,一股脑地塞入其庞杂的思想体系,制造和宣扬“日本民族优越论”、“生存发展论”和“生存自卫论”,鼓吹人种差异,自

欺欺人地打出“种族战争论”(太平洋战争是“黄种人与白种人的战争”)、“民族解放论”(太平洋战争是“解放亚洲各民族”的战争)的蛊惑性招牌,妄图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侵略奴役亚洲人民的思想武器,实现其“皇化亚洲”、“皇化全球”的迷梦。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是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其来源之一是武士道,来源之二是日本神道教、佛教和儒学中的思想糟粕,来源之三亦是贯穿始终的灵魂是“神国”、“皇国”观念和史观;进入近现代后,又加上了从西方引进的沙文主义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奉为思想理论基础。因此,是十足的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腐朽、反动思想糟粕的大杂烩、大拼盘,混乱不堪。更由于又将这一拼盘搅混,使之“现代化”、“日本化”,故所拼的内容和混乱的表述往往使人难以分类和把握其逻辑层次,这也可算作日本军国主义的一大特色。但是,正是这一庞杂的精神糟粕,武装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影响了众多的日本民众,从而在中国及亚洲太平洋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对于从近代以来遭受日本军国主义巨大残害的中国人民在今天的和平年代也在不断进行深刻的思考。特别是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及右翼势力活动猖獗,以日本首相公然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及阁僚屡屡“失言”(实为口出狂言)为代表的一系列事件也昭示军国主义思想在一些日本人中仍有市场,仍在发挥其影响力。在欧洲,近年来法西斯势力亦有抬头之势。这一切都意味着如何彻底根除邪恶的军国主义残余、彻底消除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仍然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警钟长鸣,勿忘历史。

(责任编辑:林昶)